

普列舍倫詩選

普 列 舍 倫 詩 選

張 奇 水 建 馥 譯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六 年 · 北 京

Francé Prošeren
SELECTION OF POEMS

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54.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03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577 字数32,000 开本787×940 1/32 印张2 1/2 插页3

1956年1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册

定价(2) 0.26元

弗蘭采·克薩維里·普列舍倫^①

苏联 斯·烏尔班

偉大的斯洛文尼亞人民詩人弗蘭采·克薩維里·普列舍倫于1800年12月3日生在維尔布村，离布列德湖不远，就在克拉英納^②的中心。

19世紀上半期，是普列舍倫生活和創作的年代，也就是所有的斯拉夫民族几乎在这时都經歷过的民族复兴时期。很多世紀以前，失去独立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与斯洛文尼亞人被迫在异邦——土耳其、奥地利与匈牙利——統治的領域內發展，而統治者却都是竭力想阻止被奴役民族的民族自覺心的增長的。

① 本文系苏联文学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普列舍倫詩选”的序言，徐日珪譯。

② 克拉英納，斯洛文尼亞的一个中心区。——原注。

使人民不胜负担的土耳其的压迫、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压制，引起了越来越广大的反抗。随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几个省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都活跃起来，迅速解除民族压迫与获得国家与政治独立的希望得到了巩固，而广大的人民群众都参加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愈益增强。

此外，还有一些国外的政治情况：如土耳其的衰落，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奥地利帝制由于对法国拿破崙军队作战的失败而所受的削弱，也唤起了弱小的斯拉夫人民积极参加政治生活。最后一个情况直接影响了处在奥地利政权下的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的命运。它在斯洛文尼亚与克罗地亚的知识分子中间对于摆脱异国压迫的民族解放思想的发展起着不小的影响。

几十年内，在这里都实行着使斯拉夫居民德意志化。德语被定为国语，斯洛文尼亚的知识分子就用这种语言书写和说话，甚至“斯洛文尼亚人”这个名称也是被禁止的，居民就根据省份的

名称而叫作克拉英納人、普里莫里人与霍魯塔宁人。

但是到19世紀初，不顧任何障碍，在斯洛文尼亞的知識分子中間却增長了对本民族文化的兴趣，人民成了許多世紀来的文化的保存者，維護了祖国語言的純潔性，并在民間口头創作中創造了当时無可比拟的富于詩意的艺术形式。

文化复兴运动的活动家們所寻求的正是这一宝藏。

1808年，第一本斯洛文尼亞語的語法出版了，这是最著名的斯拉夫复兴运动活动家科皮塔爾編著的。斯洛文尼亞的作家們头一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轉向祖国的語言，轉向民間口头創作。在他們中間，占首位的是詩人华林亨·沃德尼克（1758—1819），他奠定了斯洛文尼亞民族詩歌的基础。出色地繼承了他所開創的事業的就是卓越的斯洛文尼亞詩人，也就是斯洛文尼亞人称之为“斯洛文尼亞的普希金”的弗蘭采·普列舍倫。

被拿破崙所粉碎的奥地利組成了一個統一的

行政联盟——伊利里亞，其成員有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的一部分、伊斯特里亞、的里亞斯特和達耳馬齊亞。拿破崙統一了這些斯拉夫人自古以來所居住的、而且幾世紀來為奧地利分成七個省的土地，這絕對不是為了尊重民族原則，而只不過是想把堅硬的楔子插入敵人“支離破碎的帝國”，奪取它的領海，借此阻礙奧地利與英國的交通。但是使用祖國語言的權利以及奧地利哈布斯堡壓迫的暫時匿跡，曾一度在斯洛文尼亞與克羅地亞的知識分子中間引起了在伊利里亞聯盟中適當地實行法蘭西制度的幻想，因為大家都知道這一制度有軍事殖民者的性質，並且會引起許多人民起義。

因此，華林亭·沃德尼克曾獻給伊利里亞一首熱烈的頌詩“再生的伊利里亞”。

自古以來在阿爾卑斯山，
我們找到了安身的地方，
在這裡，我們曾看見過
我們的光榮的時代。
儘管我們有許多

别的称号，但是
“斯洛文尼亚人”的名字，
比其余的都古老。

在这以后，当伊利里亚不再存在而且又恢复了奥地利的更加沉重的压迫时，激动的沃德尼克写了他的著名的寓言“德国马与克拉英纳瘦马”，在寓言中德国马以其天鹅般的颈子、轻快的步伐而自夸，克拉英纳瘦马对此却温和地回答道：“我也可以这样，只不过我的脑袋经常挨打，而且又被迫站在水塘里。”

在这种复生着希望但又立刻被扑灭了的情况下，未来的卓越的斯洛文尼亚诗人弗蘭采·普列舍倫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

普列舍倫的父母都是神甫的亲属，这也就给他指示了一条信仰宗教的农民知识分子的寻常的道路。

那时，斯洛文尼亚农民的子弟在僧院的学校和神学校受“教育”，主要是造就出一些乡村的神甫。其中大部份人，经过拉丁学校的不遗余力地训练后，就成了那种天主教分子，哈布斯堡也

就是利用他們来巩固它的“極端基督教”統治者的政权的。但是他們許多人都轉向了人民，与人民恢复了血肉联系，并且成了同村人的民族意識的喚醒者，因为当时只有低級神甫才允許与人民用祖国語言來說話。

普列舍倫在他的雷勃尼察地方当神甫的叔叔那里學習了兩年，并且学得非常好。之后他就进了柳勃蘭中学，該校的校長就是华林亨·沃德尼克。这是伊利里亞存在的最后几年，我們未来的詩人正好受到了初步的祖国語言的教育。在中学里，对年輕的普列舍倫影响最大的还是斯洛文尼亞第一个詩人华林亨·沃德尼克，他总是在自己的学生当中培养一种对人民、对祖国語言以及对人民口头創作的爱好与兴趣。普列舍倫深深地体验到在奧地利統治者恢复政权后被免去职务的亲爱的詩人的命运。在共有50万居民的克拉英納，沒有留下一个完全的斯洛文尼亞学校，因此普列舍倫不得不繼續受着德語教育。他在柳勃蘭很好地念完了拉丁学校后，还上了兩年哲学班，但是他不願意研究神学，因此于1821年到了維也納，进了

大学，决定研究法律。这違反了叔叔和母亲的意志，因为他們是希望看見他穿上黑法衣的。他这种行为触怒了他們，于是連他在柳勃蘭學習时所給予他的那一点点物質援助也停止了。他們希望穷困或許可以把他引上正路。普列舍倫並沒有被貧窮所吓倒，大大地吓怕了他的却是黑法衣。他上着一部分課，艰难地度着日子，但是并不屈服。“我要坚决地更好地来忍受困苦，并經歷一切考驗，而不願抛弃自己选择的道路。”他这样給親屬們写道。

在这里，在这“支离破碎的帝国”的首都，这一个大部份由斯拉夫人所組成的帝国的首都，普列舍倫遇見了斯洛文尼亞人和波蘭人，捷克人和克羅地亞人。在这里，很明显地，在語言和行动之間以及宣言与实际关系之間的尖銳矛盾下，斯洛文尼亞人联合一致和斯拉夫人文化統一的思想，爭取民主、反对奧地利專制政体和天主教反动派的思想正在日益發展和增長。

为了回答这一事件，曾成立了一項“監督”，也就是說監視大学和教授的著名的奧普協議，在

伪善的神学校和警探学校中推行。

这是欧洲反动派猖獗的恐怖时期，恩格斯論及时曾写道：“没有一个时代再有比1816—1830年的君主的罪惡更多的了。几乎每一个当时統治的君主都应处以死刑。”①

这样，以費希特为代表的所謂的古典德国哲学就宣布了斯拉夫民族文化的終結，这些民族都是“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因而不得不“溶化”在德国民族的“帝国”中的。从这个很長时期以来就失去了独立的最小的斯拉夫民族中出現了普列舍倫，正好答复了傲慢的德国学者。

普列舍倫在大学里和圖書館里貪婪地求着知識。他感到自己离开了祖国的土地，离开了家园，但是最使他耽心的还是祖国悲慘的命运。

这兒老爷們都用德語說話，

斯洛文尼亞語言只是僕人的語言。

他想用自己的才能来頌揚祖国的人民，巩固他們的民族自觉心。

①.“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第553頁。——原注。

为了获得面包，普列舍倫来到克林克斯特勒姆的貴族寄宿学校当補習教員，这是一所为奧地利貴族的子女开办的学校。該校学生中有德国的伯爵敖埃尔斯貝格，就是以后用笔名格留恩^①發表文章的詩人。他很快地就受了这位年輕教員的影响。但是由于在高尙的学校中从未有过的罪行，由于“無神論和腐化年輕的心灵”，教員終于被赶出了寄宿学校。

在阻止斯洛文尼亞人民發展的一段時間里，反动势力無情地摧殘了人民創作热潮的任何微光。

但無論是費希特，德国的學習或奧地利的精神訓練方法，都不能使我們的詩人脫离自己的人民。

在这一个对奧地利帝国的各民族來說極為艰难与混乱的时期，斯洛文尼亞的知識分子正处在十字路口。

30年代时，在南部斯拉夫人中間發生了以

① 安納斯塔西·格留恩（1806—1876），有一个时期他曾接近过海涅。——原注。

“伊利里亞主義”為名的文化聯盟運動。這一運動是由克羅地亞的文化人士——作家柳捷維特·加依所領導的，他提議在克羅地亞語言的基礎上用統一的、普及的文學的“伊利里亞”語言教育來團結南部斯拉夫人民。有一部份以詩人斯坦科·弗拉茲為首的斯洛文尼亞知識分子都歸附了這一運動，但這一運動卻很快地被哈布斯堡利用於挑撥的目的了。普列舍倫否定地對待了“伊利里亞”語言的教育，但考慮了它的藝術性，並在祖國語言的發展中看出了保存自己少數民族面貌的道路。

某些斯洛文尼亞人士所主張的第二條道路是提倡統一的“大德意志”運動，它應該吸收奧地利及其斯拉夫居民，其中也包括斯洛文尼亞居民。德意志化的道路在普列舍倫看來是最可怕的。

大部份斯洛文尼亞知識分子所走的是第三條道路：還是留在奧地利的範圍內，而來削弱現存的制度。其中部份人抱著真的希望變成了哈布斯堡的忠實的臣民；他們希望在哈布斯堡的王權下逐漸地將“德意志”奧地利轉化為“斯拉夫”

奧地利。自然，普列舍倫不屬於這些自我欺騙的小市民之列，雖然，這些人中有許多科學界的權威，如著名的斯拉夫學者斯洛文尼亞人科皮塔爾。

斯洛文尼亞人民在自己的詩歌與傳說中保存了這樣一種信仰與希望：總有一天，剩下的斯洛文尼亞人會變得自由的。一部份傾向於民主的優秀的知識分子都這樣期望，普列舍倫也是這樣，他在富有藝術的詩中體現了自己人民的心意。

為了人民和關於人民他這樣寫着：

願我們少數的、斯拉夫的子孫，
善於開闢通向自由的道路，
並相信我們將獲得自由。

普列舍倫深信，就是在可憐的斯洛文尼亞，也將開始美好而愉快的生活，因而他等待着這一充滿希望的未來：

克拉英納，我親愛的母親，
你的呻吟聲將很快地消失，
而開始另外一種生活——
你驕傲的兒子，我的兄弟，站起來吧！

他堅定地知道一點：他的人民活着，也就是說，他們將獲得自由。他在整個艱苦的、不長的一生中都堅信着這一點。

1827年，普列舍倫獲得了博士學位，並離開了維也納。為了獲得當律師的權利，他必須在國家機關里當兩年沒有報酬的實習生。但不是兩年，整整十四年他都這樣做了。奧地利政府曾五度拒絕他從事獨立的律師活動！當局從他學生時代起就對他有所猜疑。普列舍倫在采洛夫茨住了二年，但是從維也納回來以後的大部份生活都是在柳勃蘭度過的，在那里，當律師的希望破滅了，他就在某一個律師事務所當記錄員。他很多的作品都是在這段時間內寫的。

普列舍倫很早就開始了寫作。還是在大學里讀書的時候，在維也納，應朋友的請求，他曾把他自己的某些“詩歌”拿給著名的斯拉夫學者科皮塔爾看，科皮塔爾也曾對這些詩歌提出了極嚴厲的指責。後來，科皮塔爾作為斯拉夫語出版物的帝國最高檢查員，正如禁止某些其他斯拉夫作者為爭取自由思想、無神論和自由愛好者的其他

“过失”的作品一样，不只一次地禁止了普列舍倫的詩。但是同时科皮塔尔还是把这位年輕的斯洛文尼亞人的其他的詩給了著名的詩人和爱国志士捷克人契拉科夫斯基；普列舍倫的天才很使契拉科夫斯基惊奇。他們开始通信，因此普列舍倫得以广泛地結交了斯拉夫的作家和活动家，特别是捷克与波蘭的作家和活动家。

在柳勃蘭，普列舍倫还接近了在这里滯留不久的俄国的青年斯拉夫学者斯列茲涅夫斯基。

普列舍倫最初的詩在1827年就發出了光芒，但是或多或少地經常刊印还是从1830年——主要是从詩集“克拉英納蜜蜂”开始的，这是一本不大的斯洛文尼亞語的叢刊，是在該年由于与詩人接近的文学家与社会人士的努力而出版的。但是，正如老早就可以想得到的，斯洛文尼亞“蜜蜂”不能長久在奥地利帝国生存下去，在第四集出版后就被禁止了。可能契拉科夫斯基在捷克刊物上对它的热烈的評論加速了“蜜蜂”的被禁。

关于这一点，普列舍倫曾給契拉科夫斯基这样写道：“你对‘蜜蜂’的好評一經出現，某些先

生就阻止了它以后的出版。我們知道，各机关老早就要求阻止第四集的出版了。”

但是書報檢查机关的迫害并不能停止普列舍倫的創作活动。在柳勃蘭，正如在維也納一样，他把自己的詩讀給朋友們听，这些詩在他的同胞中間傳布，这些人决不把祖国的語言認為是“奴僕的語言”。普列舍倫热爱着并發展着这一語言，这是数百年来人民内部所保存的語言，他用他自己詩的才能的力量在許多文学的斯拉夫語言中頌揚和称讚了这一語言。

我的詩，在什麼地方也得不到承認，

虽然你也貪望着人們的贊同。

我們的少女是許多別人的东西的愛好者，

她們偏愛德国的东西，

我的曲調是不合她們的胃口的，

因为我的詩的基础是祖国的詩文。

他用一种接近人民的語言来歌頌了純潔的高度人类感情的世界。他的抒情詩的特点是入世的，是高度人道的。普列舍倫的抒情詩中沒有和平与安宁的气息。因为他很好地感到：